

# 西方世界大眾媒介在教育說服和意見塑造上的功能

Henry F. Schulte

田秀萍 譯 作

大眾傳播也許不能操縱閱聽人對訊息的反應，但無可置疑的一點是，媒介對事實的理解與安排事件的優先順序方面，它們有相當大的影響。Cohen 曾說：「報紙或許不能成功地告訴人們想些什麼，卻可以成功地告訴人們，拿什麼來想想。」如果不是媒介的關係，人們對遠離己身的事物根本無法有所認識。一般媒介的使用者，都對未報導的事無所了解。閱聽人對事情重要性的認知，往往並非是事件的本質，而是因事件在報導中的篇幅和位置。媒介設定了議題，在教育民衆與形成民意的過程中，它自然扮演了某種角色。

以上所述有關媒介形象的概念，基本而言是存在于民主式的西方世界。媒介通常被視為資訊的供應者。如果媒介能提供投票者愈多愈廣泛的消息，則他們在投票時愈能做正確的抉擇。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一個世紀以前就曾說：「當每個公民有權與政府合作的觀念被接受後，公民就應該擁有的能力是：分辨不同的意見，以及評鑑那些由不同的事實所做的推論。」

傳統上，媒介被視為資訊的供應者。但是，這已經不是目前多數人的看法了。現在，媒介的工作不再只是單純的報導，並且還担任意見形成的任務。它們已經被視為民意的塑造者。

「民意」，對民主政治體系而言，是最基礎性的。當一個系統認為，決策者應該實現選民的期

望時，在政治行爲過程中，民意自然就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。所以選舉並非終結的行動。民意的評估乃是後繼行爲的根本。造成這樣的原因太多了。在某些案例上，決策者必須依民意以爲修正。而有時候，決策者則運用策略改變民意。

民意意指：通常經由媒介報導後，人們對引起其注意的政治或社會論題的反應。能激起人群高度關懷的議題多半來自選舉，尤其是有關候選人的性格及措施。此外，國內政策，國際事務等等也有相同的作用。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民意研究日益受到重視。其主要原因是：

第一，社會中教育程度的提高與普及化。這形成了較多的主動群眾。

第二，精巧的印刷與電子媒介的發展。這使得更多人能夠接收到訊息，並且對其有所反應。即使是不識字者亦可經由廣播電視了解地方性，本國的，以及國際事務。

有了以上的認識後，本國與國際間也就更加注意民意的反應。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中，那些想要謀得一官半職者，銷售貨品者，或者想要改變國家或社區制度，經濟、社會及政治結構者，都得尋求民意的支持。他們藉著媒介傳達訊息，以促進其目標的達成，並藉著那些訊息打動民意。

十五世紀時，當活字印刷傳入歐洲後，統治者早已了解到此種科技潛在的影響力。他們視其爲教育的工具，亦視其爲對權力的挑戰。對於書籍販賣及內容的控制，與誹謗的處理有關的法律與管理，在歐洲歷史上屢見不鮮。到了十八世紀末，也就是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革命時期，在印刷的自由與管制間有了明白的記述。Napoleon Bonaparte 曾說，四份嚴厲的報紙，比一千個步兵還可怕。

十九世紀，當西歐在政治上有了大轉變時，報紙漸成爲政治過程中的一部分。（大約在同時，美國的一分錢報正影響了整個社會。）歐洲大多數的國家運動均受到報紙的支助。直到現在，在許多國家，報紙仍然反映其政治政黨立場。而當電子科技帶來了新的傳播頻道，政治領導者遂發展新技術，以便接近大眾。美國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總統利用收音機與成千上萬的國民做「圍爐談天」，對他們說明解決經濟恐慌的辦法。而希特勒也曾運用收音機鼓動群眾。

今日的從政者使用更精鍊的技巧去操縱訊息。他們安排事件引起媒介的注意，而且將這些事件與媒介作業中的截稿期限聯結在一起。這就造成 Daniel Boorstin 所謂的「假事件」，以便置對手于不利的地位。

革命家通常都包括了那些被視爲叛亂者的廣播傳播者。政府部門的增大與成本的提高，其原因有時候可溯及爲，官方資訊專家的增多。而不少小型企業的發展也是經由傳播管道的有效運用。企業界與工業界往往編列相當多的預算，以維持公共關係與廣告運作。其目的地顯然就是，對部分民衆宣銷觀念與產品。在民主社會中，大眾媒介影響民意甚鉅。研究民意者 Robert Ezra Park 寫道：藉著報紙，一般大眾可以參與所屬時代的社會運動。而 Walter Lippmann 則稱自由的報業爲，在大社會中，一個必需的有機體。如果沒有評論或可信賴而明智的報導，政府就無法再運作了。因爲，沒有其他更有效的途徑以獲知一般人民的需求與想法。Lippmann 進一步說，在現今生活中，對政府而言，「說服」已經成爲自覺的藝術以及運作規律的有機體。

依據憲法規定，投票乃是公民控制的手段。但是據 Fischer 與 Merrill 的說法，選舉只是

輔助性的，通常是不完全的。必須藉其他的管道，公民才能影響公共事務。例如，公共媒介，壓力團體，遊說，與行政機構的溝通，以及民意調查。對決策者而言，民意調查是廣泛地了解大眾觀念的新技術。

對於操縱或控制報業的技巧我們已有相當的了解，記者與學者們，有時候不遺餘力地發掘控制媒介訊息內容和流通的技術。他們了解大眾傳播的流程，也分析媒介結構對訊息的影響。Breed對記者們在新聞媒介中的社會化過程研究是屬經典工作。他們知道這些媒介守門人對訊息的影響。新聞記者在報導時，往往成群結隊地，造成了一窩蜂式的新聞。他們通常都由相同的觀點報導，並且引用相同的新聞來源，使用一樣的傳播管道。

研究媒介者，對國家通訊社所攪和出來的新聞都有相當的了解。他們了解那些誇大性的新聞，往往決定了其他決策者的反應與民意。而對漏網消息的運用與濫用，則提供了政府一個匿名發言的機會。而官方從此可以在對言辭不必負責的情況下操縱民意，或同儕的反應。他們也了解，報社記者與政治勢力長期的親密結合所造成的腐化影響。他們清楚廣告對電視與廣播的影響；也曉得，有許多消費者買報紙是爲了得到廣告的訊息。

目前有種趨勢：媒介消費者，從業人員，藉著媒介傳達訊息者，或是媒介訊息的主角，都將媒介視爲具有強大力量者。因此，這更加强了媒介的力量。這種力量包涵兩個層次：它能夠提供人們訊息，使資訊基礎更穩固；同時，它也能夠說服人們，塑造民意和態度。

Blumer 和 McQuail 對一九六四年英國大選分析認爲，政客們往往如媒介要求地做爲，

並利用媒介將嶄新的政黨形象介紹給大眾。美國電視媒介對越戰的報導，促成了民意改變而致撤軍。而對水門事件的調查性報導也導致總統辭職。Grabert 認為，民意測驗調查顯示，成年人多是依賴大眾媒介獲得資訊。人們也許不會採納媒介所建議或暗示的意見或態度。但是，媒介提供了許多資料，人們即用它們來修正既有的態度，以便在多變的世界中跟上其步調。

雖然報紙在傳統上一直是大眾傳播的工具，但是證據顯示，目前不論在正式及非正式教育上，電子媒介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。在許多國家，報紙的銷售量始終跟不上人口的成長。

報紙有一度成爲學校系統以外，提供資訊的主要來源。但是，它並非完全受信賴的。Charles Y. Glock 認爲，在西歐，報紙理所當然地被視爲政黨的部分機構。這種情形在新聞處理和言論上都有。所以讀者都是小心翼翼地選擇接受報紙的意見。現今的民意調查顯示，印刷媒介的記者比過去較不受信任。

據一九八一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，在誠實與道德水準方面，記者約排名中等位置。至少有八種職業類別者——會計、藥劑師、牙醫、內科醫師、工程師、大學老師、警察、銀行工作者——在此次調查中排名優于電視與報紙記者。而電視記者排名略優于報紙記者。這也許反映了自二次世界大戰後，電子媒介對報紙優勢的挑戰成功。目前電視與廣播已成爲媒介消費者最主要的影響來源。據研究顯示，有百分之六十四的美國人依賴電視取得新聞。而一般高中畢業生，大約花費百分之五〇以上的時間收看電視。

此外，印刷媒介的實用性也受到電子媒介，尤其是電視的挑戰。一九七〇年時，加拿大會做全

國性調查，研究閱聽人對各種媒介的反應。受訪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認為，電視是最具真實性的媒介；百分之二十八者則認為是報紙。百分之五十九者以為電視是最具影響力的，而有百分之廿五者則以為是報紙。百分之六十者認為電視是最具教育性的，而百分之廿一者則認為是報紙。不過 George Comstock 則提醒研究者，對這類的調查結果不要過于迷信。

Comstock 認為，研究顯示，大眾多視電視為其新聞的主要來源，能快速傳輸資訊者，最能公平報導者，在與其他媒介比較時，電視是較受信賴的。至于報紙、雜誌、收音廣播則均位居次要。但是，在區域性或地方性事務報導上，報紙則勝過電視，成為主要的消息來源。此外，在兩週期間內，多數人看日報的頻率多于收看全國性的晚間電視新聞節目。

顯然地，不同的媒介吸引著不同的閱聽人。例如，收看電視的時間數和教育程度往往成反比。一九七六年 A.C. Nielsen Company 研究顯示，美國人每週平均看電視廿八點七小時。戶長若無受大學教育者，則增至廿九點九小時。若戶長受大學以上教育，則明顯地降至廿二點九小時。據此或可推斷，教育程度與使用印刷媒介成正相關。此外，在美國收看公共電視台者，往往是教育程度較高者。

在西方世界的民主國家裡，多多少少都視電視廣播為教育的工具。早在一九二四年，英國廣播系統尚未得到特許時，收音廣播已在學校提供教學了。在一九五二年，BBC 使用閉路電視在學校從事教課，並于一九五五開始，對學校提供正常規律的教學節目。至于 ITA 在一九五四成立後，亦加入製作與傳送教育性節目的行列。

由於BBC有部分的責任，使用廣播電視服務教育，因此它與英國開放大學（Great Britain's Open University）有密切合作關係。在開放大學尚未運作前就允諾，每週有三十小時的電視時間與三十小時的廣播時數。當其創立的第三年，它已經有大约四萬八千名學生，提供了四十三個大學課程以及三個深度經驗課程（post-experience courses）。這種情形造成了開放大學成爲BBC大學的形象。

除了英國以外，澳大利亞的電視服務網（Austrian Television Service）須同時向傳播部與教育部負責。這種安排即意謂著電視須負教育的責任。一九五一年，法國也開始了教育服務——Television Scolaire。一九五八年時，義大利成立與公共教育部合作的電視廣播教學部門。針對遠離正規次級學校區域的學生，播放各種科目教學節目。一九七三年時，西班牙利用廣播提供深度教育性節目。在三年間，學生註冊人數增加一倍。它的節目是針對以下四種學生設計的：在職而無法進傳統學校者；居住于偏遠區域者；欲完成中斷的學業者；想要擁有另一種專長者。此外，挪威、荷蘭也都有電視教學節目。在日本的NHK電視廣播網中，有一個教育頻道，每日提供十八小時服務。

本章開始即述及，政治系統及媒介在運作時即認爲，媒介可以塑造或改變態度，鼓動行爲，告訴人們想些什麼。然而，媒介的效果是相當難衡量的。Maxwell McCombs 認爲，雖然大衆以及某些科學的意見都傾向于，將勢如破竹的政治力量歸因于大衆傳播。但是，實證研究顯示，大衆傳播少能造成真正政治與意識型態的改變。

Harold M. Evans 曾說：「對於媒介是國王的製造者的描述，我是相當懷疑的。」

對一般成年人而言，態度的形成與改變不是能脫離外在影響，而單獨自我運作的。經過多年的正式學校教育後，大眾媒介是個人獲得資訊的主要來源。在民主社會中，個人是可以接觸各種傳統媒介的，如：報紙、廣播電視、雜誌。在某些情況下，個人是臣服于大量的媒介訊息下的。不過，在其他情形下是，個人與大眾媒介之間尚其他的過濾體，例如，朋友、家人、同事、雇主、勞工等等。這種混合的狀況及影響，在國家與國家間，或不同的社會中，都是不一樣的。但是，無論如何，總有部分的影響是來自媒介的。